

遼上京文物類美

THE MUSEUM OF LIAOSHANGJING
QUINTESSENCE OF THE HISTORICAL RELIC

遼上京博物館の文物の精粹

唐彩蘭 編著 Editor TangCailan



遠方出版社

Inner Distant Place Publishing House

遼上京文物櫺美

高延青題 

THE MUSEUM OF LIAOSHANGJING
QUINTESSENCE OF THE HISTORICAL RELIC

遼上京博物館の文物の精粹

唐彩蘭 編著 Write



遠方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distant place

《遼上京文物擷英》編輯委員會

首席顧問：高延青

顧問：劉鳳翥 邵國田

主任：敖日格樂

副主任：王秀軍 西林 李國 李建軍

成員：李樹成 夏連林 王未想 劉鳳江

王青煜 劉林海 唐彩蘭

編著：唐彩蘭

攝影：龐雷 陳文彥 李建奎 航片由塔拉提供

拓片：劉鳳翥 李春敏

版式設計：唐彩蘭 崔連魁 龐雷

責任編輯：王明義

裝幀設計：王鵬

遼上京文物擷英

編著 唐彩蘭

出版 遠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烏蘭察布東路666號)

發行 新華書店

裝幀設計 王鵬

制作印裝 赤峰市中正制作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89×1194 1/16

印張 12.5

字數 100千

版次 2005年7月第一版

印次 200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 000冊

標準書號 ISBN 7-80595-839-4/G·257

定價 298.00圓 \$60美圓(含郵資)

遠方版圖書，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遠方版圖書，印裝錯誤請與印刷廠退換。

印刷廠聯系電話：0476-8247638

史

鑒

二〇〇二年夏

張思卿

弘揚民族文化
振興上京經濟

辛巳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
張文彬 二〇〇二年七月

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為遼上京博物館題詞

父
吳
興
凡
女
村
及
化
凡
月
市
赤
如
及
文
興
同

大契丹國上京文物擷英

劉鳳翥



乙酉仲春

契丹第一都

草原是游牧民族活動的舞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憑藉這個廣闊的舞臺與中原農耕民族的撞擊與融和，構成了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旋律。無論草原民族有過多少風刀霜劍、茹毛飲血、不為人知的艱難時世；無論中原民族有過多少國破家亡，山河破碎的生死歌哭，回望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鐵血交融，南北方對立統一的歷史。草原民族以其强悍機動的特點一次又一次地為中華歷史注入了新鮮血液，一次又一次地進行了文化刷新。

游牧的生產方式並不是人們的故意行為，而是自然環境決定的結果。廣袤的草原不可能讓人們固定在某一地區放牧。大漠苦寒、畜逐水草、四時遷徙、車馬為家、皮毛當衣、肉奶為食，是必然的生產和生活的選擇。游牧文明的特點在於它的分散性、輾轉性和隨機性。其生產和生活經驗多是口傳身授。一般說來游牧民族的文字發明的較晚。城市的形成也是較晚的。

古代城市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是從氏族社會邁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城市是由於人的活動而產生的最為重要的社會現象。城市從其起源時代開始就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人類需求和複雜的社會發展形式，用具體特殊的空間結構來貯存並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歷史上，城市社會的變化比起農村或牧區來說，速度要快得多，留給人類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有形或無形的遺產也豐富得多。城市擴大了人類活動的範圍，並且使這些活動承上啓下，繼往開來。因此，可以說人類歷史的進程和文化的載體主要是由城市文明來體現的。城市的起源和城市的發展進程，是一個民族和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標志。到今天為止發展城市仍然是我們主導性的社會任務之一。

關於城市的起源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從“城市”一詞的中國古代漢語來看，應該包括兩個含意：“城”和“市”。

城是一種軍事防禦體系。“築城以衛君”正是早期城邑建設的主要目的，即“君”是城之“本”，城為“君”而築。城市興起的具體地點雖然不同，但是它們的作用則是相同的，即都是為了防禦和保護的目的而興建起來的。由於防禦是早期城市的主要職能，所以，高牆深池、擇險而築和內城外郭遂成為中國早期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徵。“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三裏之城，七裏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城者，所以自守也”。其意均重在防禦功能。

“市”是指交易買賣的場所。“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據考證在早商時期就有了市的基本雛形。水井是人們的公共設施，大家都要在井邊相會，於是便在井邊交易稱“市井”。很顯然，由於早期簡單的物物交換，導致了集市的出現，而集市交換的經常化，在一定的地點便形成了以交換為主的城鎮。從這種意義上說，“市”是以經濟職能為主的。這也就是說，防禦設施的建立，剩餘產品的交換，社會擴大分工是城市產生的最基本、也是最本質的原因。

公元918年，遼神冊三年，耶律阿保機在巴林草原上建立了契丹族自己的第一個都城——遼上京。國土、人民和都城是國家出現的三大標志。在草原上出現城市，這是距今一千多年的事情。這在巴林草原上也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大事件。遼上京城址則是具有轉折性的重要標志——草原地區的游牧民族出現了十分固定的政治權力統治中心，一如中原王朝建成首都。這是北方游牧民族發展史上的裏程碑，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遼上京城的營建，標

志着契丹民族由部落聯盟的性質轉變到統一王朝性質的草原帝國時代。

草原都城的影響力遠遠大于營建城市的自身。事實上這座都城的象徵性遠遠大于它的實用性。因為契丹皇族和皇親國戚，並不總是住在這個城市裏，他們還要十分辛苦地進行四時捺鉢。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漁獵，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春夏秋冬四時則有四捺鉢，一年在外的時間居多。皇帝四時巡守，契丹大小內外臣僚一并應役，漢人百司皆從行。建國後的契丹依然保持了鞍馬射獵的武風和輾轉流動的游牧傳統。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即使在皇城大內的遺址上同樣保留着大片的空地，這在當年肯定是用于安扎氈帳的所在。這一點認識筆者在土耳其的托浦卡泊老皇宮裏得到過同樣的印證。這些現象的存在並不影響帝國首都的本質規定。

遼上京是遼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也是當時東北亞地區的國際性大都市。遙想當年中亞西亞的商旅，北宋的使臣，高麗國的貢品，回鶻諸部藝人，紛至沓來。當時的中亞地區“無聞中國有北宋，祇知契丹即中國”，這座都城為古代中外文化的交往做出了重要貢獻。今天我們走進了這個古城遺址，仍然可以看到一個草原帝國的曾經的輝煌。要知道這座都城已經廢棄了近九百年的時光。到了今天，仍然有高大的城垣，清晰可見的建築遺址和經受了千年風雨的不可移動文物。遼上京是中國古代保存下來最為完整的一座皇城。它所傳達的歷史信息和考古價值將會在後人的生活中日益增值並且歷久彌新。所以我們一再敬告世人和來者：千萬別拿豆包不當幹糧。

一代龍興地，千古帝王州。與這個重要的都城遺址和重要的地區相適應的遼上京博物館就顯地十分重要了。唐彩蘭女士主持編輯了這樣一本書，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書中精選的文物是幾代文博人智慧和汗水的結晶，也是唐彩蘭克服了大量困難完成的裏程碑式的杰作。從紅山玉器到草原青銅器，從遼代的文物珍品到蒙元明清的器物，均是上乘的精品。這對於我們研究北方的歷史將會起到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作用。

我們深深地知道，在有錢養兵，沒錢打仗的文博界，出版這樣一本高品味的圖書，除了有專業的學養，還要有過人的膽量，因為出版的事情，是要承擔一定的財務風險的。無論如何這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先人創造了輝煌，後人有責任把它繼承下去，弘揚開來。在文化產業化的道路上這是一小步，祇要有了第一步，我們才能走上更為美好的未來。

赤峰市文化局局長
赤峰市出版（版權）局局長

王連發

唐彩蘭是內蒙古文博戰綫的老同志，相識多年，常有往來。前聞她編撰《遼上京文物擷英》一書，感到非常高興。近送來書稿，約我寫序，翻看後更感高興。但自覺學識疏淺，難以爲序，祇好寫下幾行感言。

巴林左旗是個好地方，興安嶺縱貫其境，烏爾吉沐淪河橫流其中，土地肥沃，水草豐美，自古就是人類的興繁之地，所以留下了難以勝計的人文古迹。首先是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富河文化的先民在這裏開拓，繼而是東胡、烏桓、鮮卑、契丹人在這裏生息。特別是開創大遼一代的契丹人，在這裏建立了著名的遼上京，成爲當時中國北方草原最大的都城，是時之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古人雲人杰地靈，實爲地靈出人杰。巴林左旗這片土地，自古便孕育各類英才。遠古時東胡、烏桓、鮮卑族中的優秀人物未能留下名字，但遼代耶律阿保機、述律平、韓延徽、韓德讓等人却名垂青史。近代以來，這片土地承先人遺澤，開文化之風，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學家，諸如李文信、李逸友先生等，就是日本鳥居龍藏等人成名也曾受益于此。去年我去巴林左旗研討籌辦遼上京博物館基本陳列，在座的二十幾位本旗學者，談起遼上京的歷史與文物，如數家珍，識見獨具，令人佩服不已。唐彩蘭便是其中的一位。

《遼上京文物擷英》一書，集巴林左旗近五十年來文物積累的精華，從興隆窪文化起一直延到清代，綿綿八千餘年，其中以遼文化爲重點，充分展示了大遼皇都的風彩，令人頓感古風撲面而來。這是一本好書，是巴林左旗幾代文博工作者辛勤工作的結晶，也是唐彩蘭同志潛心研究的成果。它的出版問世，對人們了解巴林左旗的歷史與文化，尤其是追溯遼上京昔日的輝煌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對發展巴林左旗的旅游，乃至發展赤峰市的旅游業也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前面已經說過，我學識疏淺，難以爲序。但作爲本書的先讀者，却是深以爲榮，所以寫下這幾行感言。願巴林左旗的文博事業蒸蒸日上，願唐彩蘭同志在學業上不斷進步。

內蒙古博物館館長

耶律平

2005年5月18日

烏爾吉木倫河發源于巴林左旗北部的大興安嶺山脉之中，其上游部分由北向南穿行于巴林左旗境內。巴林左旗的古代文明，主要孕育於這條河流的兩岸。其文化發展的特徵，可簡要概括為“三個支點、一條通道”。三個支點分別為新石器時代的富河文化、以祖州祖陵和上京為代表的遼文化、明清的巴林部蒙古文化；一條通道涵蓋的時空範圍要更為廣闊一些，整個西拉沐倫河以北的赤峰地區可以說是自古以來遼西區和蒙古高原東部地區交往的重要通道。

目前遼西區已經辨識出來的幾種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大都在巴林左旗境內也有發現，如小河西文化（僅見于福山地遺址）、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富河文化和紅山文化等。其中富河文化以其最初的發現地富河溝門遺址命名，且分布地域也是集中在烏爾吉木倫河流域一帶，巴林左旗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以富河文化為最多。富河文化的前身主要是興隆窪文化制造和使用篋點式之字紋簡形罐的一支人群，同時受到趙寶溝文化的較多影響，經濟生活以狩獵采集為主，與西拉沐倫河以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以原始農業為主的經濟形態有着很大差別，體現出自己的地域特色，這與來自北部草原地區細石器傳統人群的影響不無關係。由此可見，遼西區與蒙古高原東部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早在新石器時代已很頻繁。

巴林左旗是遼王朝的龍興之地。祖州一帶是契丹遥輦氏迭剌部世居之地，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于此先建西樓，後又築城，為紀念其先祖，稱城為祖州；太祖死後葬在這裏，是為祖陵。上京臨潢府“負山抱海，天險足以為固，”遼代的九個皇帝都以之為國家正式首都，延續了二百一十年；該城市的修築，被看作是契丹族的社會組織由軍事部落聯盟轉變為封建制國家的裏程碑式標志。近年來，白音罕山遼朝貴族韓氏家族墓地的發現，為巴林左旗豐富多彩的遼代文物圖卷又添了濃重的一筆。

蒙古巴林部在元代寫作“巴阿鄰”、“八鄰”，是尼魯溫蒙古諸部之一，元初攻滅南宋的主將伯顏即出自該部。北元後期，以元代“五投下”蒙古部落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喀爾喀萬戶，分裂為外喀爾喀和內喀爾喀，內喀爾喀占據了今內蒙古東部的大部分地區，其又分為五部，巴林即是五部之一。巴林部後投附後金，于清朝順治五年（1648）編為左、右二旗，但牧地不分，直到1923年二旗正式劃界，巴林左旗今天的地理範圍才得以最終確定下來。今白音敖包鄉顧家村南，仍可見清代掌旗政的扎薩固山貝子的府邸殘址。

以上簡單介紹了“三個支點”有關情況，而“一條通道”上的最典型遺存是南楊家營子鮮卑墓地，它是用考古學資料復原拓拔鮮卑從嘎仙洞南遷至陰山以南路線圖上的關鍵一環。公元2世紀初，拓拔鮮卑部落由呼倫湖南移，穿越“山高谷深，九難八阻”的大興安嶺南段，進入巴林左旗境內，留下了南楊家營子這樣的墓葬遺存。

巴林左旗自然資源豐富，人文景觀薈萃，冠以“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美譽，一點兒也不為過。我多年在這裏從事考古工作，當地政府領導、文物部門同仁的支持與幫助，底層民衆的理解與關愛，使我與這片美麗富饒的土地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在《遼上京文物擲英》一書即將出版之際，蒙編者厚愛，托我作序，我略陳自己對這一地區古文化發展態勢的區區淺薄之見，不知妥否？請不吝指教。

内 容 简 介

本書共分三章。對遼上京博物館館藏文物珍品按時代進行排序，第一章為“新石器時代至魏晉遺存”，第二章為“遼代文物存珍”，是本書的精華所在；第三章為“金元明清文物拾遺”。本書共收錄各類文物照片 345 幅、拓片 25 幅、鈐印 43 幅。附錄部分介紹巴林左旗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近年考古發掘、調查的重要遺址和墓葬，共收錄 8 處。契丹文字墓志摹錄 4 幅。以照片為主，輔以說明，脈絡清晰，資料翔實，圖文並茂，可讀性強。是巴林左旗 50 年來文物考古工作的高度概括和全面總結。大部分資料為首次發表，對研究中國北方古代文化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值。

Abstract

This book includes three chapters. Chapter 1 introduces the remains of from Neolithic Age to Wei & Jin Dynasty. Chapter 2 introduces the remained cultural relic of Liao Dynasty. This chapter is cream of this book. Chapter 3 introduces the relic of from Jin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there are altogether 345 photographs, 25 rubbing and 43 seals in this book. Appendix introduces majo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s under state protection of the Balin Left Banner and some Key sites, graves of excavating, investigating relic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re are altogether 8 places, also include 4 Qidan Epitaph rubbing. This is a book with photographs as its main body and there is a caption under the photographs, its logical is clear, and materials are full and accurate, readability is strong. This book is a overall summarize of Balin Left Banner cultural relic work since 1955. The most materials included in this book are first published and are of great value to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North China Culture.

巴林左旗文物考古工作概述

巴林左旗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北部，處于大興安嶺南端的西遼河支流烏爾吉沐倫河中上游地段。總面積 6644 平方公里，總人口 35 萬。地理座標為東經 118° 48' ~ 119° 44'，北緯 43° 36' ~ 44° 48' 之間。東與阿魯科爾沁旗為鄰，西南兩面與巴林右旗接壤，北與錫林郭勒盟烏珠穆沁旗交界。境內以山地丘陵為主，地勢由西北東南傾斜，略呈南北走向。平均海拔高度 600 米左右。

境內河流縱橫，水量較充沛。屬北溫氣候。在大小 13 條河流的兩岸多臺地和緩坡地。這種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很適宜于古代人類居住和生存，現已查明早在距今八、九千年以遠的小河西文化、興隆窪文化以及距今七千年左右的趙寶溝文化的歷史時期，先民們便在這裏繁衍生息，并創造和孕育了優秀的古代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不同發展階段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一直是當前史學界研究探索的重要課題。而以浩爾吐鄉富河溝命名的富河文化，在中國考古史上占有重要一頁。公元十世紀初，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在這裏建都立國，作為大契丹遼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元代以後，這裏是蒙古族巴林部生息繁衍的沃土。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古代先民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經 20 世紀 80 年代的文物普查和近年的考古調查，已發現不同歷史時期的各類文化遺存 514 處。其中以紅山文化、富河文化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 34 處，遼代文化遺存 331 處，其中多為遼代皇族、後族墓葬群，其它歷史時期的文化遺存 189 處。在諸多文化遺存中，遼代遺存數量多，分布廣，內涵豐富，享譽國內外。其中，尤以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遼上京遺址和遼祖陵及奉陵邑。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遼真寂之寺遺址、遼開化寺遺址和平頂山雲門寺遺址為珍貴。

巴林左旗博物館，自 1984 年建館以來，便開展了大量的文物徵集、歷史研究、文物考古工作，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幾代文博工作者為繼承和弘揚優秀民族文化和兩個文明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現館藏文物 15000 餘件，采集文物普本 3000 餘件。館藏文物中以遼代文物為主，經 1993 年和 2004 年分別由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國家文物專家組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組織的專家組兩次鑒定，有 57 件文物被鑒定為一級文物。

一、考古發掘和調查研究工作過程

遼上京位於巴林左旗旗政府所在地——林東鎮之南側，自 19 世紀的中葉起至今，諸多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均紛至沓來，對這片熱土進行調查、發掘和考察研究，大體可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至新中國建國前，這時以外國尤其是日本學者為主，在這裏進行調查和發掘，欲為他們的軍國主義服務。我們的愛國知識分子參加者也不乏其人，主要有：1846 年清代蒙古史學者張穆來巴林左旗考察邊疆水系時，踏查了遼上京遺址，并提出林東古城址即為遼上京臨潢府。這是我國學者對遼上京的具有遠見性的認識，比法國人閔宣化 1912 年考察上京時，確定該城為遼上京要早半個多世紀。1908 年至 1944 年，尤其在偽滿時期，這裏成了日本考古學者光顧的重要地區之一。先後在遼上京調查的有：鳥居龍藏、杉村永造、黑田源次、大內健、小山富士夫等，調查的重點仍是遼上京和遼祖州。我國學者李文信也參加了由小山富士夫組成的遼上京城、南山、白音高洛三處遼金時代瓷窑址的考古發掘。

第二階段為新中國成立後至“文革”前後。這時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是由兩個單位進行的。一是剛剛成立的內蒙古文物工作隊，他們將遼上京的考察作為重點，側重面主要是遼金時期。二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豐水山金龜山及南楊家營子進行的發掘。他們的重點則是史前的文化遺存。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先後在遼上京、遼祖州等地調查。1953 年 7 月汪宇平來巴林左旗對遼上京遺址、平頂山雲門寺遺址及四方城進行了調查。在洞山發現刻有“統和十年平頂山雲門寺”字樣的石徑幢一件。1957 年 7 月 ~ 9 月，李逸友、鄭隆兩人沿烏爾吉沐倫河兩岸進行調查，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等文化遺址。1958 年，李逸友在北塔山東側清理了金代墓葬三座。1962 年內蒙工作隊在遼

上京進行了歷時4個月的鑽探工作，基本弄清了遼上京的形制和街道布局，繪制了“皇城遺址地貌現象圖”。1965年，賈洲杰調查遼祖陵，並采集玉佩飾件等標本。1973年，遼寧省博物館李慶發率隊，有全盟各旗縣文物幹部參加的省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復查工作隊，對遼上京進行調查，並對遼祖州進行測繪和拍照，建立檔案。

除地方文物工作者的田野堪查外，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工作隊隊長劉觀民、副隊長徐光冀等人在富河溝門等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並在南楊家營子鎮黃土梁清理鮮卑文化墓葬20餘座。

第三階段為“文革”後至本世紀初這30年間。此段是以1984年正式建立旗博物館的專門文物管理機構為標志，以旗文物工作的考古調查為主要內容。主要有：1977年~1978年對土木富州和浩爾吐兩個公社範圍的文物調查，共發現古文化遺址30餘處。1987年~1989年3月，歷時3年至全旗文物普查結束。此次普查在全旗境內共發現各種不同性質的不可移動文物點共366處，其中遼金時期的墓葬70餘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盜掘古墓之風也波及巴林左旗全境。為了有效地保護文物，除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搶救清理了韓氏家族的部分墓葬外，遼上京博物館還搶清理並救臨摹了滴水壺遼墓壁畫、前進村遼墓壁畫。清理了林東鎮北山遼代僧人墓以及南塔周圍一批僧人火化墓。收集一批被破壞後的墓中出土文物。

1999年至2002年，遼上京遺址保護工程列入國家西部大開發文物保護重點項目。巴林左旗旗委、旗政府成立了“遼上京遺址保護領導小組”，多次組織文化、水利、林業、環保、交通和城建等部門，進行《遼上京遺址保護規劃》編制工作。分別於2000年12月7日、2001年12月30日在北京、內蒙古自治區召開了《內蒙古遼上京遺址保護工作座談會》、《遼上京遺址總體保護規劃》省級專家論證會。2002年3月13日，《遼上京遺址保護規劃》經國家級專家論證，順利通過。2004年1月17日國家文物局對《遼上京遺址保護規劃》正式批復。

2001年7月~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隊董新林、內蒙古考古研究所所長塔拉對遼上京城址開始有計劃地全面勘測、鑽探和試掘，繪制了等高綫實測城址地貌圖。8~9月依據鑽探提供的綫索，對大順門和大內宮殿區的南北大街進行試掘，基本弄清了文化層關係。2002年內蒙古考古研究所所長塔拉帶隊對皇城南城牆進行剖面挖掘，初步斷定牆城是經過三次維修加固，夯層密度清晰。在1962年工作基礎上找到了皇城護城河，三橫六縱街道。

2003年10~11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工作二隊隊長董新林等會同巴林左旗博物館對遼祖陵陵園遺址及其附近地區進行較為全面的考古調查，獲得了一批較為重要的研究資料。從地表看，祖陵前半部為土石混合的二次堆積，而後半部則為自然山體。為了確認祖陵神道位置，對半埋在地表的石雕像進行了清理，並發現緊貼石像西側的原地面上石雕卧犬一個。據此可以確定遼祖陵的神道位置呈東西方向，基本明確了遼太祖陵的位置。在祖陵南側的山嶺上發現3處東西向的磚瓦殘片，石質建築構件，如石三級踏步等。通過對環繞祖陵四周山峰的實地踏察，共發現近30處封牆豁口或築于平緩山脊的石牆。這些石牆將遼祖陵園密封成一個獨立的文化地理單元。這次調查推進了遼代陵寢制度的研究。

二、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得的重要發現

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調查，發掘、研究，巴林左旗取得了十分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史前文化的研究

經過考古調查，在全境共發現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34處。其中經過科學發掘的遺址有4處。

1、金龜山遺址。位於巴林左旗林東鎮北約30公裏的烏爾吉沐倫河兩岸。共發掘150平方米。這一遺址分早晚兩期，第一期屬於興隆窪文化，第二期屬於富河文化。

2、富河溝門遺址。位於浩爾吐鄉富河溝門。總面積為6萬平方米，地表可見灰土圈150餘個，即可有150座房址分布。發掘37座房址。經過這處遺址的發掘，從過去統稱為“細石器文化”中

區分出一種新考古學文化即富河文化。

3、楊家營子紅山文化遺址。位於林東鎮，北約35公裏。總面積為6萬平方米。發掘面積110平方米。

4、二道梁紅山文化遺址。位於林東鎮東南約10公裏的烏爾吉沐倫河西岸的臺地上，發掘面積為3215平方米，房址15座，灰坑171座。這是在巴林左旗所發掘的面積最大的一處史前聚落址。

根據以上4處遺址的考古發掘，大體弄清了本旗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即最早的是以金龜山遺址一期為代表的興隆窪文化類型，距今為8000年以遠。其次是以富河溝門為代表的富河文化，簡報報告在1964年《考古》第1期上發表，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對這一文化的時代認識尚存有分歧，一種認為它是晚于紅山文化，是以南楊家營子遺址發掘的地層關係為依據。而更多的學者則認為富河文化的陶器與興隆窪文化的陶器具有明顯的承襲關係，應是與趙寶溝文化的考古編年相同，即這是一支公元前第五千年的文化遺存。有學者還認為，富河文化是由興隆窪文化演變而來北部的一個分支。比如，現藏于遼上京博物館一批打制的亞腰形寬刃石鋤，在富河文化中有繼承，但有的便是屬於興隆窪文化石質工具。

二道梁紅山文化遺址的發掘不僅面積大，也是近年赤峰地區紅山文化遺址中較系統的一次發掘，具有明顯的區域特點。如房址平面為“刀把”形，居住時經過多次燒烤修整，一般為3-5層的燒土硬面。陶器的特點更為明顯，大量出現戳印圓點紋，筒形罐多為弧壁。

另外，還徵集一批出土於20世紀70年代紅山文化玉器，有龍形玉龍、馬蹄形玉箍、勾雲形玉飾等。這些玉器雖屬零星出土，但仍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反映出早在五千年前，這裏先民崇玉尚玉，把玉器當作禮制象徵物的史實。

新石器時代所發掘的遺址並不多，這中間尚有一些缺環，有些考古學文化也僅是研究的開始，許多內涵尚在討論之中。

（二）青銅時代

這一階段的文化遺存僅為調查階段，境內發現一批屬於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遺址和墓葬。

在館藏文物中，有幾件青銅器格外引人注目：一是青銅鼎，一是羊首青銅刀，這兩件青銅器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應是商末周初的器物。青銅刀是屬於北方系青銅器，與夏家店上層文化習見的短兵器不同，與北京市昌平等地出土的鹿首青銅刀有些相似。敖漢旗曾出土一把曲柄鈴首短劍，兩者時代相同，也應屬同一文化的遺存，出土地點又一南一北，加上奈曼旗、建平縣、林西縣等地所出土青銅矛、刀、鐮等兵器也與此刀時代相近。由此證明燕山與大興安嶺間的廣大地區在商代至周初應存在一支即有別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又有別于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文化。目前尚不明瞭這支文化的陶器形態，但多個地點，出土時代大體相同的青銅器，這一現象為今後進一步的考古研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課題。

（三）漢至魏、晉的考古發現

青銅器中還有兩件漢代駝虎相爭青銅牌飾應屬於匈奴遺物。這類匈奴青銅牌飾尚在翁牛特旗發現兩件，這與在漢代一部分匈奴東遷有關。除此外，還出土漢代印章“騎部曲督”銅印，此印章也應與匈奴東移有關。

鮮卑族遺存已發掘的為南楊家營子墓葬20座。有學者認為這是屬於東漢拓跋鮮卑的墓葬。

還出土一枚“晉夫餘率善佰長”銅印，這枚銅印反映出夫餘西遷至西拉沐倫河有關，是晉王朝對夫餘的封賜印。在遼朝初期的天顯年間，遼徵服了渤海、夫餘後，遷其部人于臨潢府定霸縣和懷州夫餘縣計四千五百戶二萬餘人。此印的發現是夫餘民族遷置、融合的歷史見證。

（四）遼代的考古發現

是以遼上京及其周圍遺迹和一批重要墓葬為主要內容，尤其在近年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得的

重要資料，對遼上京遺址、遼祖陵及韓氏家族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遼代地理考證。除了建國前經中外學者已經考定出的遼上京遺址和遼祖州遺址和祖陵外，近年出土的一些墓已確定的城址有：

全州，為秦王韓匡嗣之私城。位於四方城鄉四方城村。有學者依據韓匡嗣墓志推斷全州即今四方城城址。

于越王城遺址，為遼太祖伯父于越王耶律述魯的私城。位於查幹哈達蘇木伊斯營子東側。

經考證已確定河流、山川的名稱有：

潢水，即今沙里河，這是遼代的潢水之一，并不等同于另外的潢水，即今西拉沐淪河。

狼河，即今烏爾吉沐倫河。

兔兒山，位於烏蘭達壩蘇木境內。

平頂山，即林東鎮北 25 公里的洞山。

望京山，即林東鎮 4 公里的榆樹毛子山。

石盆山，即林東鎮南 4 公里的土龍山。

屈劣山，即林東鎮西北 87 公里的白音罕山。

嘉鹿山，即林東鎮北 103 公里的小罕山。

高陽山，即林東鎮西北 47 公里的石匠溝北山。

盤龍崗，即林東鎮北 15 公里的王家溝村。

西樓，即遼上京城。

木葉山，有學者認為位於遼祖州的大山即木葉山。也有學者認為位於祖陵 12 公里的哈達英格鄉哈達圖村野猪山為木葉山。

2、經考證已經確定的寺院

天雄寺，位於遼上京皇城東南隅，地表現存石刻觀音像一尊。

弘法寺，位於哈達英格鄉白音高洛村北山。1975 年出土一件木質骨灰盒，襯蓋墨書“弘法寺”等字樣。

開化寺，位於林東鎮南 17 公里的前召廟。發現一件石經幢刻有“開化寺”字樣。

開龍寺，位於林東鎮北 3 公里的山坡上。

寶積寺，位於林東鎮北塔山上。今存六角五層密檐佛塔一座，當為寶積寺之佛舍利塔，今稱北塔。

開悟寺，位於林東鎮南 4 公里。今存八角七層密檐磚塔一座，俗稱南塔，寺址在塔東南側有長 90 米，寬 80 米的院落址，當與開悟寺有關。

真寂之寺，即今後召廟。現存石窟雕像及寺名石刻等遺迹。

平頂山雲門寺，位於豐水山鄉洞山之陽。1953 年發現一件石經幢上刻有“平頂山雲門寺”字樣可證。

另外在遼上京皇城内已確定的除天雄寺外，與之對應尚有崇孝寺及兩寺之間的贈國省寺。城内北角的安國寺、聖尼寺、節義寺，漢城裏的福先寺。

3、遼代墓葬的發現與研究

巴林左旗的遼代墓葬除祖州皇陵外，尚有王、貴族、僧人、一般平民墓等幾種。現擇要分述如下：

①祖陵的考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遼上京博物館對遼祖陵所進行的考古調查，是近年考察最為細致收獲也較大的一次。調查證明在祖陵內有三座陪陵早期多次被盜掘，其中 1 號墓為三正室帶二耳室，顯然屬於遼代皇帝的待遇。還發現陵園內分為南北兩個陵區，北陵區為主陵區，南陵區為附葬陵區。

②王一級的墓葬秦王韓匡嗣與韓氏家族墓。遼代開國功臣韓知古之子韓匡嗣一系的家族墓地，發現於白音勿拉蘇木白音罕山陽坡的一個臺地上。墓群中的40餘座遼墓于1994年前後被當地不法分子盜掘，先後出土墓志10盒。它們分別是：

《韓匡嗣墓志銘》；

韓匡嗣之妻《秦國太夫人墓志銘》；

韓匡嗣之子《韓德威墓志銘》；

韓匡嗣之子《耶律隆祐（韓德頤）墓志銘》；

韓德威之子《耶律遂正（韓霽金）墓志銘》；

韓德昌之子《耶律遂忠（韓逐忠）墓志銘》；

韓德威之孫《耶律元佐（韓謝十）墓志銘》；

韓德威之曾孫《耶律迪烈》之妻《蕭烏魯本娘子墓志銘》；

以上八方墓志的志文爲漢字。

韓德威之曾孫《耶律迪烈墓志銘》；

韓德凝之孫《韓高十墓志銘》；

以上兩方墓志的志文爲契丹小字。

這些墓志出土後，各路方家作了多方考證，已成爲研究遼朝上層社會的主要資料。最先發表的文章是金永田發表於1998年《文物》第7期，對韓德威和耶律元佐墓志的考釋，其後分別是劉鳳翥、金永田對韓匡嗣與其家人三墓志的考釋。繼之，是劉鳳翥、唐彩蘭、高娃又對蕭烏魯本等三人墓志的考釋，以及唐彩蘭、劉鳳翥、康立君對契丹小字韓敵烈墓志的考釋。綜合韓氏墓地所出土的志文，結合《遼史》等史籍，何振祥、曹建華主編出版了《大遼韓知古家族》一書。

這些考釋文章中的各家觀點各有見地，雖尚存異議，但總起來說，均認爲這批文字資料對補史、正史是相當重要的。墓志所反映的不僅是韓匡嗣一系漢族在契丹貴族統治下的顯赫地位，也反映出整個王朝由興盛到衰亡的歷史過程。可以說，韓氏家族的興衰榮辱就是整個遼朝興衰榮辱的一個縮影。

所謂民族間的融合，最大的莫過於政治上的融合。契丹上層人物以敏銳的政治眼光看到，如果不吸收漢族知識分子來參與上層領域的活動，他們便不會維系長久的統治，也不會由落後的民族一躍爲稱雄北方傲視中原的王者。遼創造的“一國兩制”，政治體制就是政治融合的體現，也由此出現漢姓即韓、王、劉、馬等漢族成爲遼王朝的望族，而韓氏居其之首。尤其是建國之初至遼中期，韓氏以韓德讓爲代表的政治勢力左右着整個朝野，並很快地完成了封建化過程，由此而帶來經濟、文化的繁榮。韓氏的升遷軌迹代表了漢族官員在契丹爲統治民族的遼王朝中發展的一般規律。而這樣集中出土的一批記錄當時社會史實的文字，不僅不見其它漢族大姓的墓地，在契丹貴族墓中也很少見，故十分珍貴，是近年遼代考古的重要一頁。

隨後，內蒙古文物考古所清理已被盜掘的3號墓，發現一批十分珍貴的壁畫。豐富了對韓氏所代表的漢人中的達官貴人墓葬型制的認識，也使墓志的科學研究更翔實。

③契丹族官員墓。2000年2月，在寶力罕吐鄉王家溝村一座被盜遼墓中清理出兩盒墓志。這是一座夫婦合葬墓，據墓志記載墓主人是《遼史》所記的蕭訛篤幹和其妻永寧郡公主。墓志一方爲漢字《蕭興言墓志》，一方爲契丹大字《永寧郡公主墓志銘》。劉鳳翥、唐彩蘭考釋文章發表在《燕京學報》2002年新十四期。

蕭訛篤幹漢名蕭興言，是蕭圖玉之孫，蕭圖玉在《遼史》有傳，官至北宰相兼侍中、南京統軍使。蕭興言27歲步入仕途後，一直在西北邊境的烏古敵烈部任軍事長官，先任詳穩使，後升至統軍使先後近30年，至56歲時病故。永寧郡公主爲三韓大王耶律隆祐之孫女骨浴。

這兩方墓志所記錄的是遼晚期契丹皇族與後族人物的內容，對研究遼代邊防、皇族和後族的關係，上京周圍地理及契丹大字的解讀均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蕭興言墓志中提到了西樓和潢水這兩個涉及遼上京歷史，爲學者關注的地名。此志又一次提到

西樓，這一問題除宋使行程錄中的胡嶠提出上京即西樓，考證最早的是陳述先生。其後又有碑刻資料均出現過地名西樓。此志再次證明西樓即上京之別稱，而且這一稱謂在遼代很普遍。潢水即確定為今之沙里河，是首次見于出土的文字資料。臨潢府所濱臨之河即是沙里河，而不是今西拉沐倫河，西拉沐倫在遼代亦稱謂“潢水”。

耶律習涅墓，位於烏蘭達壩蘇木浩爾吐嘎查小罕山。出土墓志一盒，蓋石與志石分別刻契丹大字、漢字志文。習涅為大橫帳節度副使，其六世祖為于越王耶律魯不古。

④漢人官僚貴族墓。已舉韓氏家族中除秦王韓匡嗣外，尚有一些官僚墓，其官階各不相一，現不贅述。除此外尚有以下漢人官員貴族墓在巴林左旗境內出土：

祖州天城軍節度使蔡志順墓在林東鎮西榆樹毛子山下發現。此志確定了望京山的具體位置。

東頭供奉官王世芳墓在林東鎮南的南塔山發現，出土墓志一方。王士芳由于揭露耶律乙辛有功，使“遼主感悟，卒誅乙辛，厚賞士芳”，恩授正二品的官階銀青崇祿大夫和七品的監察御使等。此志文確定了遼石盆山的具體位置。

⑤僧人和一般貴族墓。僧人墓最主要的一座墓即是鮮演墓。1996年6月發現於林東鎮東郊的磚廠附近。鮮演為上京開龍寺圓通悟理大師，在中國佛教史上頗具影響，撰《華嚴懸談抉擇》六卷，以闡揚澄觀之說。

另外，環繞上京城址周圍主要分布在南塔和北塔附近，近年發現了一批佛教徒或信徒的火化墓。有的是以木質骨灰盒盛骨灰，有的用穹廬式陶罐盛骨灰，這兩種不同形制的骨灰盒當與族別有關。我們發現，以木質方盒形的骨灰盒多漢人，在蓋上往往寫名字和紀年，而穹廬式陶瓷骨灰罐當由契丹氈帳演變而來，應與契丹族崇佛信徒有關。

在木質骨灰盒的題字中，有一件很重要，墓主人即死于壽昌六年的西班牙院楊娘娘。此人應是在皇宮演出的樂伎。我們還從出自上京刻有“比道院”銅鐸知道，在上京城內有一支很大的專為皇族國戚演出的樂隊。

除了僧人墓外，尚發現兩座壁畫墓。主要是滴水壺和前進村遼墓，這兩座墓應是一般貴族墓。

⑥遼墓中發現的壁畫。在遼代考古研究中，最具研究價值的首推墓志，其次便是壁畫。墓志是文人用文字書寫的較真實的史實，壁畫則是那些未留下姓名的繪畫大師們用色彩描繪出又一真實的社會，再現了遼代政治、軍事、風俗、飲食、服飾、音樂、舞蹈、體育、生產生活、自然景觀等諸方面。由于遼墓壁畫所描繪的多是墓主人生前的實際生活，所以各座墓壁畫之間很少雷同，具有很强的寫實性，很少格式化。這便象保存了千年之久的錄像帶，從某種意義上，它所記錄的遼代社會比墓志更直接、更生動、更具體化。在巴林左旗近年被盜遼墓中，有10餘座墓繪有壁畫，是內蒙古東部區發現遼代壁畫墓較多的旗縣之一。

已經報導的壁畫材料主要有以下幾批：韓氏家族墓中已經清理的3座墓。其中3號墓的壁畫場面大，人物多，畫技高，內容豐富。這是韓匡嗣的墓，其死于遼代中期的統和元年（983年）。繪畫內容除了原發掘報告分析的，我們還觀察到所繪內容多為草原游牧生活，如引馬出行，駕鷹狩獵等。這裏反映漢人契丹化的過程。

除韓氏墓還有滴水壺遼墓壁畫較為重要，雖然該墓壁畫壁幅不算太大，但繪畫生動，服飾和發式較細，以飲食和梳妝兩幅內容具有主要的價值。

反映僧人禮佛的壁畫是其它地區很少見的。1990年在林東鎮北3公裏發現一座火化後又將木雕真人偶像的僧人墓，墓室壁畫繪僧人禮佛圖，反映僧人們的精神世界。

三、遼上京及周邊地區所發現的各類雕塑藝術作品

遼上京博物館近些年集中收藏了一批各類雕刻藝術作品。從質地上分有石、玉、陶瓷雕塑、金屬鑄造等類。如果從用途上分，用于佛教建築的占主要部分；其次便是與墓葬有關的石翁仲之類；再次是各類建築構件的裝飾、擺件等。這些雕塑品是遼上京博物館的一大亮點。

與佛教有關的雕塑主要出自南塔鑲嵌的石刻佛像。到1990年修塔時只剩下23件。為確保安全，